·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国家理性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张文喜

[摘　要]　国家理性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的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机械性的。在国家理性内可以发现诸如存在与应然、权力与伦理等等的对立,它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思想物”为前提。国家理性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有时是指优化与平衡的思想取代规训自由市场的国家治理,有时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指国家政治行为中的“和”“合”性。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在这其中,通过对国家理性的思考,人们既可能看见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好的国家理性,也可能看见权力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的一面。

[关键词]　国家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3]05-0054-09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3.05.005

今天,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仅拥有自己的优秀文化,而且是一个拥有天赋异禀的国家。其实,一个国家的文化不是存在于天赋中,而是存在于负载文化的社会组织及其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活动中。中国要与西方国家在合作中展开竞争并取得优势地位,关键在于国家下面的社会组织层能发挥出良好的文化作用,这是我们从国家理性思想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认识论角度的结论当然要有一个前提才有效,即要有所认识。当我们认真理解国家理性时就会体会到,它将纲领性地指引国家治理。我们除了要掌握国家治理的规律(治道)和国家治理的技术(治术)外,首先应当搞明白的是国家治理的政治理想(政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有搞清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性,才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中国化。

一、国家理性概念的含义

《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就是说,治国理政似乎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家务事”一样,其实每个人都拥有受其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影响的国家理性观:山区的农民有自己的关于国家理性的看法,也许他们把青山绿水的美好生活看作他们的国家理性观;民营企业家有自己的国家理性观,他们认为,其财产权应得到国家的绝对保护从而安全地享受其经营成果;城市中的流动摊贩也有自己的国家治理意见,他们希望当他们的生计遇到重大困难时,国家能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由此可见,国家理性并没有多么高深玄奥,而是平淡无奇,因为国家理性已经渗透在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从事的日常实践活动和行为方式中。对所有人来说,国家理性都是无可逃避、必须面对的问题,至于我们能不能在国家理性概念上达成认识的一致,那是个理论的问题,而这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入研究并给予人们以思想理论指导。马克思曾明确地将哲学与国家理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哲学是“人世的智慧”,哲学比宗教更应该关心国家。可问题在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研究——善意还是恶意地、哲学地还是非哲学地、有成见地还是无意识地、彻底地还是不彻底地、完全合理地还是半合理地”①。从马克思的这段论

作者简介:张文喜,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财产权批判与社会正义理念研究”(项目编号:021AZX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3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述可以看出,合理性是国家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一点恰恰也是理解资本主义政治国家权力技术的要害,即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创造了越来越精明的剥削形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即“国家”应该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国家不是“思想物”。他说:“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①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应该有另外一种样态。从辩证法上来说,它包含着一种力求在对立之中保持平衡的二元论,国家统一于社会,而不是在社会之外独立存在。这一点保证了国家理性的连续性,也就是保证了理想与现实、权力与道德的统一性。从这种国家理性中我们可以发现每个人具体的个体性的生活。

从客观意义上说,国家理性出现问题往往缘于没有处理好现实与理想、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如果没有清晰的国家理性观,国家治理就会失去灵魂。看看《资治通鉴》我们就会发现,前现代国家在国家治理的许多关键方面就像是一个“盲人”,很多时候处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状态中,致使国家和人民常常陷入国破家亡的险境。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前现代国家对它统治或者治理的对象知之甚少,如对全国土地的数量及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分布的情况,各类产业创造财富的情况,居民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职业身份等,前现代国家往往很难掌握准确的数据信息。因此,前现代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大多数时候是盲目的,而这一点又与官僚政治紧密相关。官僚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知识等级制。马克思说:“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指望下层了解详情细节,下层则指望上层了解普遍的东西。结果彼此都失算。”②马克思把这种官僚政治存在的弊端称为“国家形式主义”,并提出了一系列追问:前现代国家如何从传统国家演变到现代国家?传统中种种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历史效应?等等。

国家理性观与国家治理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体现着当代国家理性思考方式的影响,它是当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特殊的、正在发展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表征着国家治理活动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单纯的国家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从合理性和正当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代表了一种科学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国家理性。

那么,国家理性的科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一般地说,只有对国家的本质有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才能澄明国家理性的意义,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即东德和西德的统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集体倒戈和转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深层原因错综复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如果单从国家理性角度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强国富民的国家治理技艺的深层危机。1979 年 1 月 31 日,福柯代表欧洲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在福柯看来,“从根本上来看,就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在这里比在那里更正确,原因很简单,社会主义不要成为正确的”③。按照福柯的意见,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不清晰的。福柯明确地认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改革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那些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思考问题的人,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思考,或是从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传统来思考的人来说,在巴登哥德斯堡会议中的那些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一系列的放弃——抛弃、异端、背叛,随你们愿意怎么说——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等”④。

福柯这里说的是,在 1959 年巴登哥德斯堡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完全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2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 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7 页。
④[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4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纳了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由此,福柯强调两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同这样的放弃,他们不想放弃阶级斗争以换取公平的社会秩序;而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用,比如说,像德国那样的国家正是通过经济上的某种治理技艺而成为经济繁荣国家的。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与有无成熟有效的治理技术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用自己的"血液循环"的强度去构造属于自己的"生命内在真实性"的治理术。当然,处在20世纪70年代的福柯不可能预料到,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取得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与国家理性观的重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

第一,社会主义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在什么意义上无关乎治术。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政道是具有最根本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地域的角度,首先放眼世界,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来描述国家权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观与当今有深刻影响的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权力观根本不同。换言之,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权力技术的缺陷是我们国家权力分析中需要深刻觉察的东西,因为的确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从类型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理性理论并非一种完整的政治哲学建构,它往往过于重视政府体系运行的法律原则而忽视政道。具体来说,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理性是被一种所谓"三权分立"主宰了的工具理性。黑格尔早就指出,德国人其实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国家理性,他们谈论国家事务,相当于他们假装知道国家理性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黑格尔的言外之意是,只有哲学家才能清楚地认识国家理性的本质,才能清楚认识世界历史。在这点上,黑格尔看待国家理性的方式似乎又是错误的,即为了实现对它的利用而去呵护一种美丽的、骗人的国家神圣的表象。实际情况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国家理性观只能提供一个国家迷局的各种意识形态方案。

第二,传统的中国政治缺失国家理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得出晚明因为缺乏数目字管理这样的治理术而最终走向衰落。的确,国家理性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西方提出国家理性概念的立足点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看,国家理性究竟是指什么呢?国家理性首先要有一套国家理论,简言之,即国家在社会中承担什么角色。或者说,国家理性指的是能够使存在与应然、道德与权力统一起来的东西,甚至还包括对领土及其范围内的人民的治理规则。这可以算作国家理性的规范性定义。那么我们如何来描述这一规范性的国家理性概念呢?举例来说,从国家理性角度看,钓鱼岛上的每一块石头或每一棵树,在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义上来说都具有神圣的意义。换句话说,国家理性概念的一部分就是由这些石头或这些树构成的,这些石头或这些树赋予这个"国家"完整的意义。同样的,我们一直强调的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也是这个意思。按照国家理性的指引,一个国家的政府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国家政治应该如何运作。也可以说,国家理性指的是一种实施和扩大统治或治理的各种方式或手段方面的知识。

第三,现代国家理性与传统国家理性不同。与现代国家不同,传统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巩固和扩大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财富和权力。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国家理性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得以充分表达。传统国家理性更多地考虑国家本身,很少考虑国家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国家的经济基础或市民社会,特别是很少考虑社会与国家理性的区别和联系,很少关注国家的中心任务即改善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如健康、技能、教育和寿命等。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国家理性概念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国家看成社会的"例外",而把人民的幸福和利益看作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要改变这一观念,就需要通过社会概念去理解国家理性观。

在当代社会,国家理性总是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息息相关。现代国家理性的产生基于两点:一是经济自由,二是国家权威。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我们曾经实行过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而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相互适应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而言,为了发展生产力,问题的关键不再是克服传统观念认为的自由与计划的矛盾,而是优化和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平衡自由与计划、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及运转程序。在我国国家理性中,优化与平衡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规训自由市场的治理。历史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合理性也取决于各种对立因素的动态平衡。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使国家理性已经融入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国不时开展的人口普查(包括居民的年龄、职业、婚姻和生育状况、文化程度、财产状况等信息)帮助国家在准确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各种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当然,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数据的统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有不同的目的,一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发展,另一种是为了操纵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利用这些统计数据加强对治理对象的操控。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一般都很重视生物政治学,在今天的信息社会时代则更重视数据信息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曾经深入研究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权威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国家治理理论的源头。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治理合理性的论调已经彻底失去了市场,相反地,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性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果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是真正清晰明智的国家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伟大实践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使我们能够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的生成路径和基本内涵。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理性的批判

自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问世以来,一种由科学社会主义所激发的国家理性得到了广泛传播。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区别于过去一切“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其最鲜明的特点是:

第一,权力和权力政治无关于“永恒的正义”和“永恒的真理”。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传统的国家理性观认为,国家理性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一个国家的内部运动法则。而“现代社会主义”错误地认为,应当把“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①

恩格斯的观点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空想社会主义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建设国家”理念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永恒的正义”理论没有科学地反思政治国家的阶级性;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太想重塑社会,因此设计了一个所谓更合理的社会,使社会成为国家管理和改变的对象,意图在于使之走向“永恒的正义”。换言之,在空想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应按照理性王国的先进标准操作社会,所以需要一种“社会公共工程”思维。与此相应,哲学家是这一社会工程的首席专家,他们按照所谓完善的理念精心设计社会秩序。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上述观念给予了严厉批判,指出其要害在于所谓“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等观念只不过是些空洞的名词概念罢了。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关于现代国家政治的科学是一门基于“物质的经济事实”来思考国家相关问题的科学。国家理性的本质在于物质利益,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哲学家对理性的唯心主义崇拜,认为后者颠倒了现实和观念的关系,其实质是一种有效的精神统治方式。也就是说,从国家理性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和由这种国家理性指引的解决政治、道德和法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于那种深信不完善的社会是因为非正义、非平等、非自由的观念干扰的观点。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②在这段话里,恩格斯阐明了资产阶级把“国家”和“理性”联系起来,这是国家理性概念的进步之处。因为直到16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世纪初,在传统的政治话语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国家理性的资产阶级性质决定了它属于意识形态的颠倒的观念。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是,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①。理性的胜利,不过是一种将自由和剥削微妙地合二为一的模式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理性的困境就源于此。从此,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理性,一种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理性。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表征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理性的日益成熟,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理性呢?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理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意义上的国家理性概念最早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文本中的相关思想。如果我们要深入阐释国家理性概念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意义,就要把上述经典文本置于以下两种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中:一种是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的语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述的国家治理的语境。

我们先看第一种语境,即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的语境。自启蒙运动开始,一种辨识度很高的政治话语应运而生,这就是政治由理性主宰,具体体现为用正义进行统治、用法律实现正义,良好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理性的成就,而政治乃众人之事,相应的政治理性就体现为立法机构立法和决定国家大事时应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协商,其目的在于有效解决各种冲突,维护人类共同体正义的生活方式。在资产阶级国家理性的设计中,理性和正义、正当性和平等性、政治和法律都是紧密联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孔多塞就预见到统一的重量和度量标准有方便贸易的好处,他的思想到19世纪时成为乌托邦项目。斯科特为此指出:"过去被应用于林业、重量和度量、赋税和工厂的简单化和理性化现在则被应用于整个社会的设计。这样产生了工业般强有力的社会工程。工厂和森林还可能被私营企业家来设计,而操纵整个社会的雄心只能由民族国家的项目完成。"②

此外,启蒙学者试图建立代表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这是启蒙学者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他们都热衷于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即更理性、更正义的社会制度。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宏伟目标中往往已经隐含了一些标准化的事物,他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从而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并且使所有人享受社会福利设施等等。这里所谓的标准化就是指"理性"和"正义"。当然,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别,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并不符合理性和正义的原则,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一样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于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出现了一种政治的戏剧化运作,导致那些试图通过理性改善人类社会状况的国家项目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了一种理性,而建立在这种理性之上的"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③。

我们再看第二种语境,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阐释的国家治理语境。这个语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治理依据。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单纯的理性思维所提供的方案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现代国家治理面对的新问题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④。第二,历史唯物主义认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9页。

②[美]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国家的最初形式起源于暴力,那时国家处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话语存在巨大矛盾,如现在的美国,当经济严重扭曲变形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其陷入某种准战争状态,似乎唯有国家理性逾越道德的底线才能治愈这种经济病症。而依据社会主义的国家理性,国家治理主要是满足人民的需要,或者说国家治理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要按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最新创造出来的交往形式进行公共管理,这当然需要技术进步的支持。《共产党宣言》中对技术进步的肯定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技术的应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性,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服从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理性,社会主义国家理性承认一种历史合理性、经济合理性、行政和公共管理合理性。社会主义国家理性为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科学性和合理性论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中理性的“国家的特征”

国家是什么?按照传统的观点,国家就像是一个超人,它占据一定的空间,拥有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其实,国家并非作为自然事实而存在。大致说来,随着现代国家的崛起,效用、收益、利益这些概念成为国家理性概念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国家理性都不过是基于利益的理性。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现代国家治理主要不再采取“禁止、防护、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不会压制消费,而是令其最大化”,“我们每个人都被提醒,要去交际和消费”。① 这就是人们在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国家理性时看到的、自由和剥削合二为一的权力技术或者说治理技术运作的根源。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理性是由强力、金钱和政治技巧组成的统一体,是一种权力与道德极度割裂的国家理性,或者说是将道德信念束之高阁的“国家”理性。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自由主义是一种自我吹嘘的意识形态,即使高居权力顶峰的总统也给人毫无政治理性的感觉,多数政治人物都把时间花在散布和传播谣言上,政治生活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复杂而无情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间,参与者是受与国家理性相反的政治理性引导的。由于对议会民主政治和对其他国家的不信任,美国属于典型的国家理性和政治理性分裂的国家。从这一点看,不是国家理性而是政治理性才是理解国家的关键。政治学家们观察到,美国的所谓“国家理性”本质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野心的政治理性。或许有人会问,“野蛮”的国家模式为什么能够维持和发展下去?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普罗大众意识到自由无处不在,通过给他们制造自由的幻觉而使他们感到心安理得。在这一情形下,国家治理的悖论深刻地烙印着自由主义的信念,即认为政治人物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去做坏事。霍布斯在《论公民》一书中就强调派遣间谍和情报人员窃听他国情报的重要性。在今天,这种国家理性表现为依靠网络、智能电话、谷歌眼镜实现对国家的监控。西方式的国家理性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 1984 年不仅仅是奥威尔小说中的 1984 年。

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理性的可接受性、真切性的强调能够展现一种可能性,即国家理性可以被塑造为一种对政治共同体的真正信任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性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国家理性与政治理性的一致性,即那些被国家理性所推崇的事情,同时也是政治理性所许可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性和政治理性为什么能够相互一致呢?答案就在于“和”与“合”,这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特点的基本方法,而这一观念和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性的本质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要正确理解这一观点,就应当首先搞清楚中国国家理性构建的主要目标或目的是什么。在权力结构建基于威慑工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国家理性也是由治理技艺和统治技艺两部分构成的。法律语言是“共和的语

①韩炳哲:《精神政治学》,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1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言”,与共和政体相对立的是专制政体,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不同,共和政体是通过法律和人民意志限制统治权,专制政体是绝对专横地行使统治权。“当国家不属于人民之时,便完全不再是一个共和国了”①。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只有尊重人民的利益才是正义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才是正义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理性是将对人民有利的和有德性的因素作综合考量后的结果。下面将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疫情防控作一个比较,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疫情防控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甚至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秉持所谓的自由人权观念,故不可能采取将染疫群体隔离的措施。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真不如曼德维尔描述的“蜜蜂社会”,疫情防控如同采蜜人采集蜂蜜要被蜂群蜇痛那么困难。相比之下,我们国家很好地解决了“采蜜人”的问题。在治理技术上,我们将“蜜蜂社会”作理性化和标准化处理,使之成为更清晰、更便于管理的单元。可以说,科学性是疫情防控的前提。当然,更为关键的因素还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即政道,我们的党和政府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秉持对人民生命和健康负责的理念,自觉地承担起组织大规模疫苗接种、保证防疫物资供给、大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的责任。疫情防控的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坚定的政治理想作支撑。随着国家理性导入了更精细的网格化防控措施,我们国家实施疫情防控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是国家可以科学合理地介入疫情防控的所有事务,如制定公共卫生标准、对全部防控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对防控不力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进行问责等等。当然,中国国家理性构建的主要目标还需要回应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的秩序空间。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够实现自己在解构人类历史上的旧秩序的同时构建人类社会新秩序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世界空间秩序范围内开展的颇具特色的政治试验和探索,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国家理性的理论和实践范围。

斯科特曾经注意到,列宁是现代国家理性主义者。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列宁用建筑工业类比党的组织工作。他说:“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②在这里,列宁强调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重在政道,应当使之产生“神圣的权力、理性的逻辑”③。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矛盾和问题,列宁把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诉诸作为手段的专业化技术、等级制度和报纸上有效并可以预期的组织讨论,这样政治理性就变成了准工程师理性。列宁说:“假使我们有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像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④无论如何,列宁的这些观点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但这种逻辑还是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在时间维度上,他希望苏联“落后”的生产力能够赶上先进的国家。历史地看,列宁的理想是很宏大的,它要第一个在清理整洁后的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理想,这个理想具有革命先锋和高度现代化的特征。为此,列宁把党视为“不动的推动者”⑤。

五、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充分发挥其潜力,那么就必须生产出更多的新空间,这是法国哲学家列

①[德]吉塞拉·波克等编:《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甘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0页。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xviii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

⑤[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斐伏尔提出的思想观点。这种思想观点的意义在于,社会主义的新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所谓新空间是指由日常生活、语言等构成的一幅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图景。社会主义空间的核心问题是,它是否能够证成社会主义的将来空间革命的合法性,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与空间中实际存在的矛盾是如何解决的。

从历史上空间生产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曾走过两条道路,其中一条道路是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产生的。列斐伏尔追问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否生产出了自己的空间呢?他认为没有。理由之一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没能够改变生活本身,而只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或政治设施"①。"在建筑、公众习惯、城市设计、公共仪式中,对视觉的、理性的和有纪律的社会外观的强调非常流行。……这些表面上的秩序和目的有时会与社会中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呈反向的关系:'在所有这些乌托邦的例子中,组织者都将用理性、对称的术语、用规划、可控数字、统计、估计和精确命令的数学语言来描述它。就像在对军事殖民点的构想中一样,它理性的一面无法掩盖随之而来众多的痛苦、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乌托邦计划在这方面与它略有相似'。"②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苏联的国家目标制定得太大,它对社会的了解很少却又想更多地去干涉社会。理由之二是在欧洲范围内建构的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众多卫星国本质上是相互之间视他者为潜在的对手。理由之三是苏联集体化的实践和逻辑没有生产出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新的空间,这是因为它的领土包含在整体意义上的欧洲空间秩序之中,而且苏联体制从列宁时代开始便笼罩在一场与资本主义全面对抗和竞争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理由之四是苏联体制为了取得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以超常的速度发展生产力,但这一过程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实际上是"强化和集约化版本的资本主义模式。试图依靠千方百计地优先发展'强项',即大规模企业与大城市,而获得高速发展","而所有其他地方相对于中心"来说,"则处于被动的边缘化状态"。③ 因为中心和边缘存在矛盾,或者说因为不平衡发展致使自身无法克服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总之,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原则上不能将被支配的空间与被取用的空间相互结合。

列斐伏尔的这些观点显然已经超越了国家理性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关注的问题全然与国家理性不相干,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将他的理论看成是在回答国家理性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还有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探索,那就是"中国式的道路"。列斐伏尔将苏联体制与当时(即1973年前后)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对比,它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性观点是,至少在今天看起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战略竞争不是发生在物的生产层面,而是发生在新的空间生产层面。列斐伏尔厘定了一个价值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虽然使用"物的生产"这一概念,但依然有一个更好的价值序列,那就是,"社会转型预设的空间的集体所有和管理是建立在'相关利益各方'持久参与的基础之上的;相关利益各方有着多元的、多变的,甚至是矛盾的利益。因此,这种社会转型预设了对抗——的确,这种对抗已经出现在'环境'问题之中"。④ 列斐伏尔这段论述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在回答何为社会主义的空间问题时,不能将社会主义仅仅视为只是在空间中进行物的生产,或者说不能把社会主义看作只是循着经济增长和物质积累的道路前进,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社会主义便遗忘了新的空间的生产。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呢?列斐伏尔认为,这就是让人民与空间完全融入一个差异化社会的建设过程,而这同苏联体制强调的"集中化"和"大幅度的简单化"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设想为全体人民共同进步,协调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避免都市

①[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1页。

②[美]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20页。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22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化以牺牲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现象发生。在列斐伏尔看来,“中国式道路”某种意义上就是“增长”和“平衡发展”的同义词。①

第二,空间的矛盾对社会主义有一种警示意义。“在革命时,党在全俄国只有484个‘农民’党员。”②“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见过布尔什维克党人,尽管他们可能听说布尔什维克的法律承认农民对他们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唯一有农民追随的革命党是社会革命党,他们民粹主义的背景使他们往往不赞成列宁的独裁主义观点。”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应当表现在空间秩序质的飞跃上。列斐伏尔认为,“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④,因此,“一个正在将中国转向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就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⑤。如果“有人希望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国家里继续成长与积累,亦即持续在空间中生产事物”⑥,就必须释放生产力的全部潜力,塑造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而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所谓的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实质上就是指终结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这就意味着“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⑦。

第三,全球空间的创造构成了日常生活转型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新空间的生产需要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具有超越国家的全球正义秩序的特征。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根据列斐伏尔的这些看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要改变世界,就要对空间进行重组。列斐伏尔最后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新的空间生产尚处于一种初始阶段,要生产和扩大社会主义自身的空间还面临很大困难。⑧ 社会主义将成为未来新的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强大,社会主义需要掌握空间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列斐伏尔的这些观点予以认真考察。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21页。

②[美]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③[美]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58页。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⑤[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页。

⑥[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⑦[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⑧参见[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15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